

# 文化遗产视域下形意拳传承的三重进路： 记忆重塑、价值重构和秩序重建

侯天媛<sup>1</sup>，郭玉成<sup>1, 2</sup>

(1.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2.上海体育大学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 200438)

**摘要：**基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当下的形意拳传承正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研究从文化遗产理论出发，运用比较研究法、实地调研法等从记忆重塑、价值重构和秩序重建3个层面对当下形意拳传承机制进行分析，以探究形意拳传承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认为形意拳传承通过“见景见情见精神”的记忆重塑增加形意拳时间延续和空间认同的认知维度；通过“见人见拳见生活”的价值重构扩大形意拳功能范围和影响领域；通过“见众见智见和谐”的秩序重建规范形意拳传承中的理念与行为。记忆重塑、价值重构和秩序重建为形意拳搭建起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化桥梁，为形意拳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考，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形意拳；传统武术；身体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4)02-0037-07

## A triple approach to the inheritance of Xingyiq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Memory reshap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HOU Tianyuan<sup>1</sup>, GUO Yucheng<sup>1,2</sup>

(1.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Academy of China Spo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of Xingyiquan is changing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uses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Xingyiquan from three levels: memory reshap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Xingyiqu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ough the memory reconstruction of “catching sight of scenery, feeling, and spirit”, the inheritance of Xingyiquan had been increased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time continuity and spatial identity; by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of “catching sight of people, usage, and life”, the scope and influence of Xingyiquan had been expanded;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catching sight of the public, wisdom, and harmony”, the concepts and behaviors in the inheritance of Xingyiquan had been standardized. Memory reshap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has built a bridge from history to reality and the future for Xingyiquan, provided new thinking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Xingyiquan, and also would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ports.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Xingyiquan; traditional Wushu; body culture

收稿日期：2023-11-10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中华文化基本问题研究”单列重大项目“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基本理论研究”(SC20ZDZW013)；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TP2022101)。

作者简介：侯天媛(1992-),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 houtianyuan@139.com 通信作者:郭玉成

“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民族，不曾感受到过传统的力量”<sup>[1]</sup>。文化遗产保护的勃兴及其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范式演进，集中体现了人类认知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sup>[2]</sup>。中国在2004年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已有20年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不仅形成中国化的非遗保护理论和方法<sup>[3]</sup>，而且成为当代社会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框架<sup>[4]</sup>。中国非遗保护虽然在申遗履约、制度建构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sup>[5]</sup>，但“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sup>[6]</sup>，想要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留中华文化的本相，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人类所写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实就在我们血管里流淌着”<sup>[7]</sup>。中国武术以口传身授的身体优势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成为“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sup>[8]</sup>，并于近年来充分调用中国非遗保护政策以宏观设计与民间传承结合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情的传承路径而蓬勃发展。

武术拳种的案例研究对于揭示我国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微观互动和复杂关系、探索传承与决策的原理具有见微知著的力量。当前，学术界围绕跨学科视角对武术非遗传承的历史形态<sup>[9]</sup>、空间文化<sup>[10]</sup>、社会分层<sup>[11]</sup>以及法治协同<sup>[12]</sup>等较为本质的传承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并在城乡融合<sup>[13]</sup>、乡村振兴<sup>[14]</sup>和社会治理<sup>[15]</sup>的宏大国家议题下，探索武术如何结合地方社会发展实现社会重组和文化自信，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表现出积极的社会价值，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文化遗产视域下武术自身的传承路径尚缺乏系统阐释。形意拳具有形简意深、内外兼修的运动特点，与太极拳、八卦掌共称为“三大内家拳”。通过探讨形意拳传承的现实理据，以重塑记忆、重构价值和重建秩序作为研究的三重进路，解释文化遗产视域下形意拳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生命张力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实践体系，并展现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对我国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作为文化遗产的形意拳表现出比以往更为丰富的社会价值和更为多元的时代价值。据此，研究以两个形意拳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所在地——山西晋中和河北衡水的形意拳传承现状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方法：(1)比较研究法。形意拳自明末“化枪为拳”后，由戴隆邦改编为戴氏心意拳，后经李洛能等共同创编而成

以三体式、五行拳和十二形拳为主要内容的拳种，经历时性转型与共时性脉络的辩证交织，形意拳逐渐形成了分别以山西、河北为主的多样化传承流派和传承形态。对同源多流的两个形意拳传承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凸显形意拳传承中多元地方文化与制度生态之间协调机制的共性，发掘更为深层的传承逻辑。(2)实地调研法。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形意拳传承中实践表达的具体情形、国家制度与民间传承之间的协调过程以及人们对形意拳传承的真实认知只有通过实地调研才能获取。因此，研究走访两地的各级体育局、档案馆等政府部门和武术协会等相关单位进行实地调研。(3)参与观察法。于2020年8—11月，2021年10月，2023年1月多次对山西晋中市及下辖太谷、平遥、祁县等地和河北衡水市及下辖深州等地的主要形意拳传承流派的拜师仪式、节庆活动、师门聚会、日常训练、表演竞赛以及高峰论坛等特殊与日常的传承节点进行参与式观察。与2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名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以及50余名传承人弟子进行交流并建立长期联系，了解形意拳的存续现状。

## 2 记忆重塑：形意拳文化认同的社会建构

费孝通<sup>[16]</sup>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文化遗产视域下重塑形意拳记忆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见景见情见精神”的逐层空间历史叙事，展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下，形意拳的当代传承如何以具有鲜明地方记忆的身体经验和历史实践为载体，以当地形意拳非遗传承人为见证，通过空间重塑、仪式活动和身体感悟，在地方性空间中塑造超越时间的情感和精神链接，创造具有历史感的空间文化和具有时代感的社会认同。

### 2.1 见景：源于空间历史的形意拳记忆溯源

形意拳以重建形意拳“历史现场”、拓新非遗传承空间的方式，将拳种历史与现代传承贯通，重新建立起拳种与公众的连接，成为创造形意拳公共性空间文化的前提。形意拳的前身——戴氏心意拳自戴隆邦起在山西祁县生根发芽，由李洛能在山西太谷保镖期间改为形意拳后发展壮大，李洛能年迈返乡后在河北深县(今河北深州)广为传拳，不同地域空间的人文风貌逐渐塑造出山西派和河北派两个拳理相同而风格迥异的形意拳流派，形成独特形意拳历史文化景观。

相比于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和古籍里记载的历史，形意拳以更为直观和生动的身体运动方式，能够让人对地方文化的传统生活产生一种鲜活感和纵贯感，延续传统的“正宗”也因此成为人们对形意拳习

练者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在形意拳的重要传承地,山西晋中、河北衡水的形意拳武馆、拳师旧居、形意拳纪念堂等传承空间以修旧如旧的古典院落形式散落在众多古建筑中,至今仍为习武传拳的空间,与地方空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历史气息融为一体,体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随着城镇化进程,当下形意拳的传拳方式早已从严格的师徒制传承转变为较为自由的师生制、甚至义务性传习,习练场所也从“三面围墙”的传统封闭性空间扩展至公园、场馆等开放性空间,习练内容也转变为更适用于表演和竞赛的套路练习。现代化的冲击下,坚守与创新的张力在非遗传承中普遍存在,以地方空间中的历史实景讲述形意拳历史轨迹,从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形意拳真实演变历程,成为缓解这一张力的有效途径。

传统实体空间作为承载形意拳社会记忆的空间载体,在从私宅而重建为旧居、纪念堂、博物馆以及文化小镇等公共场所的同时,塑造成为新的形意拳“记忆之场”,由此而贯通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是形意拳当代传承的起点。河北以深州形意拳文化小镇为代表,对形意拳文化影响下的非遗、健身、康养、文化和旅游等产业进行现代化融合转型的尝试。拓新后的形意拳传承空间,通过形意拳传承场景的再现和延续,使参与者在与空间的短暂交互中完成对形意拳社会记忆的重构,形成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意拳文化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将具有地方感的形意拳历史记忆通过新媒介传达给社区居民,成为形意拳非遗传承记忆新的生长点。

## 2.2 见情:基于情感取向的形意拳记忆传承

“地方”通常是凝聚社会记忆和感情归属的开放空间。哈布瓦赫<sup>[17]335</sup>认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仅仅是机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因此社会框架之下的记忆具有认知属性和情感属性。康纳顿<sup>[18]</sup>将群体性的记忆形态提炼为“社会记忆”,并提出社会记忆通过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和口头传播等形式传递和延续社会的集体情感。情感态度作为社会记忆实践的关键特征,比枯燥乏味的认知记忆拥有更为持久和有效的力量,成为形意拳建构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

山西晋中的地方性文化中,“武乐双峙”是当地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文化形态。“武”,是尚武修艺的追求,也是奋勇向上的精神;“乐”,是及时行乐的生活,也是积极乐观的心态<sup>[19]</sup>:形意拳作为积极乐观的身体符号参与到当地人的人生仪式、岁时活动、节日庆典等生活记忆中,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

与晋剧、秧歌戏等文化形态共同构成晋中“武乐双峙”的完整地方性文化体验,使得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能够感受到共通的社会性情感。

河北形意拳的传承充分展现“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特质,李洛能、郭云深、李存义、张占魁等河北形意拳名家,均将习练形意拳视为“涵养正气”<sup>[20]</sup>之道,与其他武术拳种传承人在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之秋共同通过感大义、急国难的传承实践将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人文性格刻写入河北形意拳的社会记忆,使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对形意拳认知与情感的深刻连结。

作为一种身体技艺,形意拳的优势在于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情感的“剧场”,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sup>[21]</sup>。在形意拳的延续与传承过程中情感让社会记忆变得鲜活,使得形意拳传承不仅是后人对前人身体的简单复制,更是以地方社会和地域文化为支撑,塑造了以地方感为内源的情感取向,保证参与者能够完整理解其延续的意义与价值。形意拳的参与者通过融入地域文化的身体技艺,勾连起似曾相识的情感体验,实现更为深刻的社会记忆传承。

## 2.3 见精神:延续地方认同的形意拳记忆重塑

在形意拳传承实践中,习练者不仅通过身体的体悟,强化人与自然的关联,充实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还通过形意拳的社会交往,强化了个人与传承代际之间的纵向社会关联以及与拳门内部的横向社会关联,传递出一种源自于民族传统的生活态度与强健精神,有助于个人建立更为清晰的自我和民族认同。

形意拳历史上,民间传承中形意拳人将“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核心理念的自我表达:清末时戴魁“应邀乔家,保商路,穴点草原恶霸六十二”,留下了除恶扬善的美誉;车毅斋拒绝向日本人传艺,维护了民族尊严;孙禄堂<sup>[22]</sup>、张占魁<sup>[23]</sup>提倡“以形意拳为本”普及国术,以谋求修身尚武、民族自强。这些英勇向善、刚健有为的人文精神已成为地方社会记忆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形意拳师也由此获得当地人的尊敬,实现从武人向武术家的转变,成为地方文化的精神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在形塑形意拳社会记忆的同时,形意拳社会记忆也强化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正如哈布瓦赫<sup>[17]</sup>所说,社会记忆的真正价值在于满足于当前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对过去的重建,由社会记忆而形成的共同意识对于形意拳群体的凝聚和延续具有重要作用。山西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相交融的独特地域文化,是

华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组成<sup>[24]</sup>,也是滋养形意拳文化的母体。燕赵文化中豪迈悲悯、笃志厉行的精神特质也是形意拳在国家危难时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形意拳不但浸润当地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还融入当地人的文化精神与性格禀赋,深度传承地方传统生活的质感和智慧。随着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形意拳活态传承关乎着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生命力之源,恰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明的优势”<sup>[25]</sup>。

### 3 价值重构:形意拳功能体系的理性挖掘

形意拳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必然与当代社会的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发展演变,衍生出新的功能价值。当代的形意拳在传统身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从“见拳见人见生活”的功能视角,以科学、理性、客观的方式超越以往形意拳理论对身体的主观感受,重新对形意拳价值进行审视,挖掘、考辨形意拳符合当下社会的时代价值。

#### 3.1 见人:“以人为本”的形意拳价值回归

形意拳传承的能动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对形意拳文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即大众群体对形意拳价值的判断。根据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总体方针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价值,高丙中<sup>[26]</sup>提出:“非遗保护有全新的内容,就是对遗产的传承人群的重视,并且是优先重视。”回归人本是形意拳传承的核心价值属性,也是形意拳文化中需要高度重视的方面。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形意拳,不仅是少数拳师追求至臻的艺术品,更是一种兼具审美、教育和实用价值的大众化的身体运动方式,因此以表达性的文化建构引导主体行动,使民众成为对形意拳进行再创造和再诠释的文化主体。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分析思考、调动资源,使更多人拥有了解和感受形意拳文化的机会、享有选择参与形意拳传承的权利,创造出真正适应时代的文化模式。

吉登斯<sup>[27]</sup>提出,对身体有规律的控制是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得以维持个人生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形意拳以“拳以致用”为目的,经历从古战场到民间武艺、再至走镖护院等不同用途的转变,承载了人在追求生命体验中与自然的无限关系,蕴藏着地方文化中最通俗、最普及的生命哲学。在当下,个体自觉自愿地习练形意拳,意在体悟形意拳中精妙的东方智慧,还常常借助自媒体平台分享个人习练形意拳的日常、传播对形意拳的理解和认知。人们对形意拳价值需求的变化意味着形意拳不再是“正宗”和“专业”的专享,早已被普通人纳入到自我认同和审美体系的价值

实践中,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身体语言,在“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建构中发挥作用。

当然,形意拳在服务大众健康方面的功能与机制上的基础性研究仍显不足,尚未形成与当代社会认知相匹配的科学、客观系统的理论体系,一方面阻碍了受益者合理性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形意拳传承从乐享到共享之间的隔断。因此,形意拳这种基于自我建构的社会推及还需要相关研究与时俱进,形意拳技术体系的完善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与现代科技的力量,使真正从中受益的个人以理性化的表述将主观个体经验转化为客观实证经验,形成与当下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形意拳理论体系,从而发挥形意拳更大的价值。

#### 3.2 见拳:“拳以致用”的形意拳价值反思

形意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而来,通过三体式、五行拳和十二形拳凝结了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感悟,在“拳以致用”的实践与感悟中不断往复,具有知行合一的身体教育功能。在漫长的历史形成中,形意拳不仅集聚了长期以来的技击经验,还蕴藏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记忆的观察和认知,直至当代,形意拳传承中仍保留有大量前人的生活痕迹:用“迈步如犁地,落步如生根”等农耕社会的生活经验描述形意拳身体姿态,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昼夜节律安排习练时间,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节规律调整习练内容和强度。因此,将形意拳回归于真实的生活,才能了解形意拳凝结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智慧。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预示”<sup>[28]</sup>。正如形意拳拳谚“原汁原味不原样”所传递的理念,文化不可能脱离时空而存在,形意拳的套路和技法是由人根据社会需要而发明、创造、实践、发展。将习拳融入个人生活所用正是形意拳传承的常态。孙禄堂<sup>[22]</sup>曾言:“按个人所做事业,而为一动一静,一言一默,皆有形意之作用。”当代,形意拳已被视为一种生活形态而不仅是一项运动项目,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习拳实践与身心感受,在具体的实践中体悟生活、生命当下的意义。

形意拳从历史生活中走来,在融入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时,需要经历一个以“拳以致用”的态度解构传统、理解传统、重续传统的过程。每一个源自“拳以致用”的创造性变化,都会赋予其新时代意涵,让形意拳真正“活”在当下,进而更大限度发挥形意拳文化理念惠及地方、服务民生的价值。

#### 3.3 见生活:“归于日常”的形意拳价值重构

“传统的控制力愈发丧失,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

愈发被本土与全球的交互辩证所重构,个体就愈发会在多样性的选择中被迫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sup>[275]</sup>。探求传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将形意拳置于现代生活系统的价值判断中,重构功能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多元主体对于形意拳的需求从传统社会的单一化和同质化演变得日益多元化、差异化和精细化,形意拳的价值随之表现出技击、健身、教化、康养、审美和经济等不同维度的衡量依据。多元化的价值需求使作为非遗的形意拳衍生出产业化的经济效益,并随着创新赋能和产业转型发展为“非遗业态”。形意拳文化小镇建设的初衷在于结合环境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资源,创建服务于人的生活、生态融合的宜居地,形成产、城、人、文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sup>[29]</sup>。但如何真正将形意拳作为稀缺资源发挥出强劲的健身康养和旅游文化价值,以市场化的商业逻辑构建起形意拳文化小镇的经济生态体系,还需要长期系统的观察探索 and 运营调整。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生活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形意拳以深植于生活之中可触碰的、可感知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习练理念,形成长久维系人们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淳朴善良的人性品格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继承自己民族原来应有的知识传统,对于个人以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安顿内心、从而适应飞速变化的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4 秩序重建:形意拳传拳伦理的当代转向

形意拳之所以能够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中世代传承,不仅得益于形意拳具有哲理性的技术体系,更在于形意拳在身体实践中融贯了中国传统伦理中对于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与家国意识的交互理念。“把传统视为神圣的东西加以维护的态度,是秩序有效性最为普遍,也最为悠久的根源”<sup>[30]</sup>。文化遗产视域下,形意拳文化正是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通过“见众见智见和谐”的社会转向,既满足大众情感需求,又寓之于国家文化秩序,发挥形意拳社会治理的作用。

##### 4.1 见众:从“独门秘技”到“普世知识”的形意拳秩序推延

迪尔凯姆<sup>[31]</sup>提出社会整合状态与社会道德规范共同影响着任何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人,形意拳作为一项文化遗产,不仅是因为形意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实践方式,更是因为形意拳文化所呈现出基于传统中国文化所构建社会团结及其道德基础的重要力量,深度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责任观念和情感表达。作为活态传承的文化,形意拳依附于具体的人群,遵循严苛

的传拳规矩和繁琐的入门程序,是具有强烈私有性的“独门秘技”。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代代拳师传拳择徒时体现出的“家国意识”为形意拳负载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延续性的文化秩序。

成为文化遗产即意味着把原本私有的产权让渡,塑造为公共性的地方文化<sup>[32]</sup>和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sup>[33]</sup>,由传承人、共享者共同维护,这不仅需要形意拳传承人从心态和理念上发生根本性的巨大转变,还需要将形意拳作为“普世知识”进行秩序推延。空间属性使以公共享有为目的的形意拳社会化结果带有强烈的“地方感”,使人能够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体验到形意拳文化的“地方特色”。而且,形意拳还能够通过高位的文化势能引领文化潮流,为地方带来整体性的文化“领潮效应”,以此为出发点建立的河北深州形意文化小镇和山西张壁古堡形意文化小镇都是结合地方文化资源,在旅游、健康、文化等方面开拓能够体现当地形意拳历史文化特色、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创新成果。

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形意拳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也变得更加亲和与多元。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通常就是多元主体在其中都能够进行自我表达<sup>[34]</sup>,在形意拳传承中表现为多方参与、多方付出、多方博弈、多方获益。形意拳文化传承保护创造公共维度的同时,能够兼顾各种各样的利益与关切,涉及个人关怀、公众利益、地方利益,甚至国家形象等多个维度,为更多的人和地方带来更大的益处。

##### 4.2 见智:从“有形之手”到“无形之手”的形意拳秩序协商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社会受益的文化事业,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动力决定了非遗制度在中国能够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最大限度保证形意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化转型中缓冲靠岸,确保形意拳传承发展不会因一时之私利而损害长久之大计。但在政策、法规、制度难以渗入的层面,政府职能与社会责任的边界仍然有不少模糊之处,不足与掣肘在所难免<sup>[35]</sup>。若只是僵化管理,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主体一方面难以发挥主体性的价值,另一方面被架上传习责任的枷锁,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在形意拳的实际传承中,经过政府部门与个人或群体长期磨合并友好协商,探索出一条以“国家在场”的方式且由民间力量主导传承的路径,呈现的结果既尊重了传统的伦理秩序,满足大众情感需求,也能体现国家文化秩序,保障并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顺利实施。政府部门作为权力主体承认民间社会的基本文化

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公共文化,体现“以人为中心”的优先价值,形意拳传承者也充分发挥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其中体现的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民俗协商”模式<sup>[36]</sup>,正是通过借鉴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民间“礼俗互动”的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sup>[37]</sup>,为形意拳传承从“有形之手”向“无形之手”的主体性转变,以及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向“活动主导,民众参与”的国家秩序与民众需求的深层融合,提供了富有弹性、良性循环的具体操作路径。

因此,只有对形意拳传承的认识持有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才能使非遗保护工作更符合形意拳本身的实际需求,使形意拳的当代传承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同时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文化资源。

#### 4.3 见和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形意拳秩序共建

形意拳的传拳秩序,反映的不仅是形意拳群体内部的相处之道,更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方式。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在于鼓励人们以合作的心态,为人类社会寻求一个超越独占、消弭纷争的有效途径,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展<sup>[38]</sup>。这意味着,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是文化传承中蕴含的人文理念和思维结构。换言之,围绕武术技击性和表演性的评价方式并不是文化遗产的首要考量因素,武术的每个拳种流派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形意拳基于血缘、地缘等的传承谱系逐渐衍生出多个流派,不仅在拳术的风格技法上逐渐有所区别,在传拳秩序上也体现出祖先崇拜和神祇崇拜的差异。随着传承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因差异化而产生的“门户之见”与“正宗之争”也逐渐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形意拳传承的思想阻碍。但文化接触、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大同世界的共同道德秩序下,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化和别人文化的了解与欣赏而消除对抗,从而实现“美美与共”的理想社会<sup>[39]</sup>。深州形意拳协会和晋中市太谷形意拳协会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相继成为形意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此后两地的各级文化部门分别根据地方特色资源,将形意拳的传承保护与体育、旅游、教育等产业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形意拳非遗保护与传承模式,共同为形意拳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形意拳以口传心授的身体文化记录中华民族的生命记忆,不仅是凝结中国传统智慧和东方审美的人类遗产,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建构的珍贵文化资源。在文化遗产视域下,经由记忆重塑、价值重构和秩序重建

3个层面的宏观设计,对当下形意拳的社会发展传承实践进行统筹规划,实现了形意拳传承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其中,“见景见情见精神”的记忆重塑增加了形意拳历史见证、地方享有的认知维度,是建构形意拳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历史支撑;“见人见拳见生活”的价值重构扩大了形意拳的功能范围和影响领域,是提升形意拳大众接受度和产业增长率的现实依据;“见众见智见和谐”的秩序重建规范了形意拳传承中的理念与行为,是引导当代形意拳合理传承的持续保障。在这三重进路的协同作用下,形意拳才能够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在保持其独特性和连续性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创设出符合当下社会生活逻辑的文化生态,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注解。以文化遗产视域发现和运用形意拳中运行文化事象的规律、方法及风险,掌握形意拳历经数百年沧桑仍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机制,同时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为前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保证形意拳当代发展的不竭动力,也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 参考文献:

- [1] 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1.
- [2] 朱刚.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 民俗研究, 2023(6): 55-68+153-154.
- [3] 王晨阳, 刘魁立, 朝戈金, 等. “非遗保护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笔谈[J]. 民俗研究, 2023(6): 5-25.
- [4] 安德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新的文明交流框架[J]. 民俗研究, 2023(6): 42-54+153.
- [5] 巴莫曲布嫫. 申遗与履约: 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进程看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J]. 民俗研究, 2023(6): 26-41+153.
- [6] 何兆武. 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8-19.
- [7] 罗新.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批判、怀疑与想象力[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98.
- [8] 程大力. 传统武术: 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J]. 体育文化导刊, 2003(4): 17-21.
- [9] 谭广鑫. 原始武舞与巫术交融的武术萌芽状态[J]. 体育科学, 2019, 39(4): 81-89.
- [10] 姜霞, 刘新民, 黄繁, 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原生态和现代生存需求的矛盾——以西部红拳为例[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2): 60-65+88.
- [11] 谢中元. 依武而传: 广东醒狮的武术性传统及其

- 城乡传承[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4): 63-71.
- [12] 冯泽华.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治协同保护[J]. 体育学刊, 2022, 29(2): 32-38.
- [13] 吕思泓, 李文鸿, 吴琦, 等. 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反思与路径重建[J]. 体育学刊, 2022, 29(5): 29-33.
- [14] 杨青, 刘静. 乡村振兴视域下“以拳塑乡”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建构及治理——基于“武术之乡”陈家沟的田野调查[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1): 87-95.
- [15] 郭学松, 刘佳丽, 方千华, 等. 民间武术组织参与村落社会治理——我国台湾鹿陶洋宋江阵的人类学考察[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2(4): 86-93+99.
- [16]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15-22, 158.
- [17]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8]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0.
- [19] 袁年兴. 作为认知图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平遥经验[J]. 晋阳学刊, 2011(5): 14-19.
- [20] 李洛能. 形意拳拳谱[M]. 太原: 太原市武术挖掘整理组翻印, 1984: 1.
- [21]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笛卡尔的错误: 情绪、推理和人脑[M]. 毛彩凤,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20.
- [22] 孙禄堂. 江苏全省国术运动的趋势[J]. 江苏, 1929(12/13): 67-69.
- [23] 张占魁. 张占魁形意武术教科书[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183.
- [24] 周建明, 刘畅. 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333.
- [25] 徐岱.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战略[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1): 6-13.
- [26] 高丙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4): 56-63.
- [2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28] 刘魁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4): 51-54.
- [29] 李康安. 特色小镇的内涵、发展模式及核心理念研究——基于北大核心与 CSSCI 来源期刊的分析(2014—2020)[J]. 中国商论, 2021(19): 52-57.
- [30] 马克思·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胡景北,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76-77.
- [31]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M]. 谢佩芸, 舒云,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336-338.
- [32] 高丙中. 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 文艺研究, 2008(2): 77-83.
- [33] 单霁翔.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9: 67.
- [34] 赵世瑜, 李松, 刘铁梁. “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J]. 民俗研究, 2016(6): 5-13.
- [35] 薛泉.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15, 174(4): 202-210.
- [36] 高丙中. 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J]. 民俗研究, 2020, 151(3): 5-12+157.
- [37] 张士闪.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J]. 民俗研究, 2016, 130(6): 14-24+157.
- [38] 刘魁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J]. 山东社会科学, 2010(3): 24-27.
- [39] 费孝通, 麻国庆.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0: 294.